

◎ 国家图书馆 编

部級領導干部

LISHI WENHUA JIANGZUO

历史文化讲座

· 2015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 国家图书馆 编

BUJI HINGDAOGANBU

部級領導干部

历史文化讲座

-SHI WENHUA - JIANGZUO

· 2015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5 / 国家图书馆编.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6

ISBN 978 - 7 - 5013 - 5826 - 7

I . ①部… II . ①国… III . ①社会科学 - 干部教育 -
教材 IV . ①C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2716 号

书 名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5

著 者 国家图书馆 编

责任编辑 许海燕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nlcpress@ nlc. cn (邮购)

Website www. nlcpress. 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5826 - 7

定 价 85.00 元

目 录

- 天下归仁 王 蒙 (1)
- 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 卜宪群 (15)
- 世界格局中的欧盟及中欧关系 冯仲平 (50)
- 考古现场：文物背后的商王朝 唐际根 (65)
- 禅宗与中国文化 明 海 (83)
- 中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及历史特点 方 铁 (113)
- 历史的心结：琉球问题与中日关系 谢必震 (140)
- 废墟上的奇迹 李工真 (168)
- 中国民间宗教与中国社会 马西沙 (195)
- 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 冯天瑜 (217)
- 白银货币化：明朝中国与全球的互动 万 明 (235)
- 中国歌曲百年 陈晓光 (250)

天下归仁

王 蒙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10月生于北平

(现北京)。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等职，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



1962年任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曾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文学院院长，兼任南开大学、浙江大学、新疆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或者名誉教授。

文学创作以小说为主，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共发表长篇小说8部，此外，还有大量中篇、短篇、微型小说集，评论集，散文集，古典文学研究专著，自传，旧诗集，新诗集，并有取自英语、维吾尔语的译作。1993年出版《王蒙文集》10卷，2003年出版《王蒙文存》23卷700万字，2014年出版《王蒙文集》45卷1700万字。

所谓天下归仁，在《论语》中的原话是“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自我约束，能够恢复到西周时期的礼法，天下人就会承认你是一个仁

德之人、仁爱之人，这是一般的解释。但是，从字面上来说，它也可以从另一面来解释，天下归仁的意思就是仁归天下，即整个社会能够按仁爱的原则、仁德的原则运转起来，整个国家能够顺着仁爱这样一个核心的价值变得更加美好。

一、以德治国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依靠德行、道德来治理天下，那就如北极星一样，是最高级、最明亮、最稳定、最恒久的一颗，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群星围绕在它的周围。这是孔子对“德”的地位的一种阐释。

孔子认为治国理政的思路有两种，一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是说用行政的手段来引领百姓，用惩罚的手段来管理百姓，这个方法虽然很有效，但并不能让百姓自觉认识到违反这些规矩是可耻的。虽然他们尽量避免受惩罚，尽量避免受制裁，但缺乏羞耻之心。另外一种思路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说如果用道德来引领百姓，使礼数成为一种规范，使道德成为一种约束，百姓就会知道违反道德是可耻的，不讲礼貌、不讲礼法、不讲礼数、不合礼仪，也是可耻的，这样就能达到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的效果。这句话里的“格”字，古人解释为“认可”，是心悦诚服之意。在现代语境之下，我个人认为它是指一种规范，一种风度，一种品级。所以“有耻且格”，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人要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达到一定的规范，一定的格调，一定的品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孔子处于乱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中央政权式微，各诸侯国争权夺利，血腥厮杀，民不聊生，孟子曾以“春秋无义战”来形容这一历史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希望用道德和文化来拯

救世道人心。这样一种以德治国的理念，是古代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理想主义，也可以说是古代的中国梦。孔子要挽狂澜于既倒，把一个互相争夺、互相厮杀的社会，挽救成一个讲文化、讲道德、讲礼法的社会。孔子曾经受难于匡，饭都吃不上，而且有人扬言要杀掉孔子，孔子的弟子都很惊慌，但孔子相信只要上天无意灭绝斯文，只要上天还要延续文脉，就不会让他罹难。他是斯文的救主，是斯文的几近唯一的火种，他活着的使命在于延续与重建斯文。“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这句话说明了孔子的使命感，他坚信只要上天不要斯文灭绝，匡地的人就不能把他怎么样，相反，他更要用斯文来救世，也就是所谓“斯文济世”。

据我自己的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以德治国”至少有三次出现在中央文件里。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议中，又提出了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议中，又提出了以德治国。以德治国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提法。

（一）斯文之道

孔子提倡斯文，反对野蛮与粗暴。孔子虽然提倡尚文，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不尚武。那时的诸侯国，如果没有武器装备，没有军队，没有计谋，就无从巩固政权。但是，孔子至少首先强调的是文，强调政权首先是教化之权，是引领之权，是制定规则之权，制定礼法之权。到了孟子时期更明确提出，仁政不是暴政，而是王道。王道是什么？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提倡软实力。孔子认为这是人性的需要和自然，因为人性本身就是美好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

者，未之有也。”他从最简单的事情说起，从每个人的家庭说起。在家庭中你对自己的父母有孝心，父母对你有慈爱之心，你对自己的兄弟姊妹有悌之心。随着一个人的逐渐长大，这些东西就慢慢发展成各方面的美德，孝心到了社会上就会延伸成忠心，悌之心就会延伸为义之心，等等。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仁爱之心。所以孝悌之人，不会犯上作乱。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实际的情况没有那么简单。

礼义廉耻，被叫作“四维”，加上孝悌忠信，合称“八纲”。汉代以后又总结出“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另外对于掌权者，孔子提出“恭宽厚敏惠”，这五个字虽然没有“仁义礼智信”普及，但对于掌权者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恭”就是恭敬，不仅要敬业，更要敬重工作中的每一个人；“宽”就是宽容，要容得下不同的意见，容得下不同的风格；“厚”就是心存厚道，与人为善；“敏”是指对人民有好处的事，做起来要有效率；“惠”则是要务实。这五个字可以看作是孔子对掌权者的要求。

从这样一种中国文化的理想里面，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民族延续至今的某些依据。我曾经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一篇文章，觉得很有道理。为什么中国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西方基督教的思想，在客观上是性恶论，它认为人是有原罪的，所以它的很多制度都是从人的自私心、贪欲、原罪出发来设计的。但是，马克思认为人性是向善的，人的自私心是私有财产所造成的，人本来并不自私，而是这种不合理的私有财产制度造成了人的自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阶级社会、私有财产社会是人类的史前时期，人类真正的文明史还没开始，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才能称之为人类文明史。孔子的许多想法，是能够与马克思主义对于未来的愿景相衔接的。孟子曾经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人不但爱自己的父母，

也以对待自己父母一样的心情、一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人的父母；不但要爱护自己的子女，也要用同样的心情照顾天下的孤儿。我所接受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所以，孔子学说里面包含有对人类社会美好生活前景的积极愿望。

（二）君子之道

《论语》中多次用对比的方法来比较君子和小人的不同，以至于朱熹说：“君子与小人之所为不同，如阴阳昼夜，每每相反。”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君子讲原则，讲价值，讲道理；而小人却只追求利益。孔子说小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小人在一起从不考虑原则，不考虑道理，只是动心眼，干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容易贫困，因为君子坚持原则，不考虑自己的利益，但即便贫穷仍然是君子。而小人一旦贫穷，就会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的特点是凡事都从自身找原因，而小人的特点是碰到什么事就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君子不党，君子不器。”意思是说君子不拉帮结派，照顾大局，有责任感，有使命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对凡事都有自己的见解，不跟着起哄。小人自身能力缺乏，所以易抱团起哄。孔子不但把君子描述得十分透彻，对小人的心态理解得也很精确，所以说孔子善于洞察人心。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一身浩然正气，所以“君子坦荡荡”。小人除了害人，就是嘲笑人，同时认为别人

也在嘲笑自己，所以“小人长戚戚”。君子谦恭，“戒慎恐惧，哀矜勿喜”。周恩来总理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他认为做一个领导者要“戒慎恐惧地工作”，小心谨慎，随时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如泰山，因此不能犯错误，更要力避说错话，做错事；即使看到别人失败了，也不要幸灾乐祸，哀矜勿喜。

上述这些是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论述，从负面来说，并不符合我们提倡的人人平等的理念。孔子或者后代的朱熹也好，认为君子和小人完全是两路人，这是他们理念中一些负面的东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积极作用。

这种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孔子认为君子对中国的集权社会结构起到了支撑作用。

从秦朝开始，历朝历代政权一直追求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治理方式，东周那段分裂的历史给了中国人足够的教训。这种集中管理的模式必然会先依靠一部分社会精英，或者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来予以维持。所以，君子应当是一类受过教育、有文化、有责任、有担当的社会群体。这类群体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有先进性、不纠结于个人利益和享受，一旦进入权力系统，将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所以孔子对君子的这套要求，已经成为对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的一种劝勉，成为有志于成为社会精英的人的一种更高的自我要求。

举个例子，洋务运动中对发展现代冶金工业有贡献的张之洞就是这样的人。张之洞死后，同僚们到他家里去，被他家徒四壁的景象吓了一跳。家里只有墙，连家具都没有，睡觉都在地上。当然张之洞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人，他也有其他方面的缺点。但是，从这点上来看，他确实体现了一个君子的要求。

第二，孔子鼓励不同出身的人都积极上进。

《辞海》和《辞源》上认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有两种，一种是从社会身份上说，一种是从文化教养上说。如果仅从社会身份上说，这是一种消极的说法，官员出身，教授出身，就算君子；而临时工出身，或者是父亲因故劳改过，那就算是小人，这种区分显然是片面的。但是，从文化教养来说，孔子鼓励每一个人学习上进。实际上中国的各个朝代，尤其是宋朝以来，非常注意通过科举考试，让所谓“蚁民”都有上进的机会。

我们现在看孔子关于君子和小人的教导，里面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

（三）中庸之道

之所以强调中庸之道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点就是“尚一”，希望把国家统一起来，把各种事情归结到一起。用老子的说法就是“天得一以清”，天如果得到了“一”，符合了这个大道，天就是清的，没有雾霾。“地得一以宁”，地得到了“一”，没有地震。“神得一以灵”，神获得了“一”，就能发挥作用。“谷得一以盈”，山谷得到了这个“一”，就能够达到充盈。“万物得一以生”，万物之所以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它符合这个“一”。孟子的说法是“天下定于一”，中国人认为尽管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只要抓住了“一”，所有的问题就都可以得到解决，这是中国的一种“尚一”的思想。中国从理论上虽然没有西方那种多元制衡的传统，但它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

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原则是多元制衡，人既然天生是有弱点的，因此人和人之间就需要互相制衡。在一定的规则下，相互制衡，就能把握方向，取得平衡。而中国的平衡，很难表现为在一个时期几种不同力量的互相牵制、互相平衡。中国的平衡常常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就像俗语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国强调中庸之道就是强调“不为已甚”，即不要做得太过，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厚德包容。《论语》也十分讲分寸，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对于“不义而富且贵”的人，孔子的态度是既不仇富，也不仇官，即便认为不正确，也只是远远地看着，如浮云一般，既不羡慕，也不痛恨。

孔子关于中庸之道的学说，我称之为“一颗仁心，两手准备”。既考虑进，又考虑退。“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意思是说，宁武子这个人，当国家有道时，他就显得聪明；当国家无道时，他就装傻。他的那种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他的那种装傻别人就做不到了。这就是《论语》中最具有智慧、最具有想象力的一段，既有韬光养晦的谋略，又有治世兼济天下、乱世独善其身的明哲。同时，孔子又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国家有道，要正言正行，敢说真话，敢涉风险；国家无道，还要正直，但说话要随和谨慎。这就是战略与策略的差别，进取和自保的不同。孔子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需要我的时候就去做事，不需要我就默默隐世。“用行舍藏”是孔子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以上这些例子都是孔子对于“中庸之道”的解释，可进可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四）世道人心决定一切

孔子认为决定一个诸侯国或者一个家族兴衰的最重要因素是世道人心。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闻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意思是说，大家不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不注意好好学习，树立了榜样，不能够学着做，指出了要纠正的东西，也不改正，这是我所忧愁的。

这段话不仅听着很亲切，而且在今天依然有效。注重世道人心，不仅在客观上让老百姓少干坏事，还有助于对权力形成一种

道德监督和文化监督。多元制衡的权力监督在中国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但是，道德监督和文化监督却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以德治国的这套理论，对现代中国人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二、无为而治与礼治

“无为而治”是道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追求知识的人，其知识一天比一天多；追求真理的人，其主观意识会越来越少，头脑越活越简单，以至于逐渐减少至“无为”。又说“无为而无不为”，只有做到无为，整个社会组织的活力和积极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无为而治”是古代中国人治国理政的最高理想，孔子也是提倡无为而治的。《论语》里边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意思是说，能够无所作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的王位上罢了，这是孔子“无为而治”的思想。

“无为而治”如果真是什么都不干，那么还有一条罪状，就是不作为，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但是“有为”也不要扰民，要简政放权。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是消灭一切国家机器，消灭法院，消灭军队，消灭公安，消灭政党。社会只需要一批统计员，这批统计员根据社会需要来调节商品生产，调节生活资料。所以我认为，孔子和老子所设想的无为而治，实际上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观点遥相呼应。所以，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偶然。

除了“无为而治”，儒家还有一个理想，就是用礼来代替法。《礼记》上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经》上有一段诗，“相鼠有皮，人而无仪”。老鼠都有一副像样的皮毛，人岂能无仪？“人而无仪，不死

何为?”人如果没有仪表，不讲礼貌，一副野蛮无礼的样子，还不如死掉算了。“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老鼠都长着牙，可是人却不知道羞耻，不死还等什么。“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人如果不懂礼貌，不懂规矩，还不如快点死掉。《论语》里讲了很多的规矩，吃饭有规矩，见人有规矩，待客有规矩，上朝也有规矩。这些规矩不仅仅指行为、举止，还指表情。子曰，色难，意思是说最让人敏感的是人的表情，最难办、最要注意的是人的表情。

中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个人，或者一个人办的事，甚至于说这个人写的不讲道理的文章，叫面目可憎。尤其是当领导的，千万别搞出个面目可憎来。2500年以前，孔老夫子就给国人提出了消除面目可憎的掌权人的任务，孔子认为掌权者不仅要和颜悦色，更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

三、劝学、示范和教化

命名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反过来有时候我们又被名所束缚。孔子非常重视名实相符，正因为如此，所以他非常重视劝学、示范和教化。

一般的专家认为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我认为孔子作为教育家与他的政治学说是分不开的。为什么他那么重视学习，重视教育呢？因为他主张以德治国，主张君子之道、斯文之道、中庸之道、彬彬有礼。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经过教化、经过学习才能实现的，不是天生就能够具备的。他认为对一个掌权者来说，他的示范作用和教化作用，比他的具体管理还重要，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理想化的成分，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到现在我们也仍然继承了这样一个传统。我们的干部工作，强调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优先，首先考虑德的问题。孔子关于学习讲了一些非常好的话，比如说

“温故而知新”，注重历史经验；比如“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是要拿活人当教材，一个人比你强，就应该向他学；一个人比你差，就应该看看自己身上有没有这种不足之处，这个太不容易。毛泽东主席所提倡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和儒家“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学说有很密切的关系。“举一反三”“三人行必有我师”“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在生活中学习。孔子又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不思，就会感到迷惘而无所适从；只空想而不读书学习，就会心中充满疑惑而无定见。所以要认真地读书，认真地学习，认真地思考。孔子有关学习的倡导中，最精彩的、最使我感动的是他的“反求诸己”的思想，就是遇到问题先求助于自己。《论语·子罕》篇引用了《诗经》的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意思是说唐棣的花朵，在风中翩翩地摇摆。我岂能不想念你吗？只是由于家住的地方太远了。对此，孔子却不这样认为，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意思是说如果真的想念，又岂会觉得遥远？孔子认为“唐棣之华”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美丽的花朵，它代表的是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美好是一种心性，只要天天想念美好，美好的事物就会在你心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社会道德缺失、食品造假、助人反倒被讹诈等等不良社会现象屡有发生。以孔子的思路，要想社会风气好转，就要从每个人自身做起，只要想学好，就能把坏事变好事。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要为仁行善，那么仁德自然而然就到了。王阳明讲知行合一，孙中山讲知难行易，这都和中国人重视心性之学，重视道德，重视文化，重视礼仪有关。

四、传统文化的命运与未来

孔孟的思想在当时是用于治国平天下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套治国理政的理论。这套理论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并不算很成功，当时孔子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甚至于自嘲“戚戚如丧家之犬”。对于当时的诸侯国来说，孔子学说如“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讲得很好，但并不符合春秋时期各国征伐的实际，在诸侯混战的时期讲仁义道德，显然有点不合时宜。但在另一个方面，孔子的学说，老百姓很爱听。于是汉代之后的统治者认为孔子的学说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世道人心，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俗。孔子学说不仅仅是教化百姓忠君爱国，更是教化执政者施行仁政，爱惜民力，不要轻易动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当国君要有当国君的风范，当臣子要有当臣子的忠诚，做父亲的要有做父亲的样子，当儿子的也要有当儿子的样子。孔子死后，他的学说愈加被重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后来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全国各地大修孔庙、孔林、文庙，一直修到韩国、越南，不仅影响了东南亚，还影响到世界许多地方。孔子成了中国的一个文化基因、文化符号，孔子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使几千年来中国在文化上充满自信。

中国有了孔子，可以说有了定心丸、主心骨，但同时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两千多年以来，孔子学说并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没有绝对性的突破和发展，因为它的地位太高，其他学说难以望其项背。这种情况古人早已看透，李贺诗曰：“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李白也曾经说过：“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同时，李白还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可见古时就有不少文人对孔子学说持不同的态度。这也说明任何一

种文化，一种学说，都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调整和突破，才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孔子喜欢西周，喜欢文王、武王、周公。武王伐纣，建立西周，作为一个新生政权，采取各种惠民政策，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和支持，创造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到了东周，国家乱作一团，所以在孔子看来，西周就是最理想的社会。这当然是孔子思想中保守主义的一个方面。今天我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依然有小部分人在议论，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在已经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了，这种议论当然不准确。

所以，我们应全面理解孔子思想。任何一种思想，一旦长期不变化、不发展，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出现什么问题呢？一方面是前边所说的“白发死章句”的问题，另一方面还会出现逆反心理。中国是一个大国，所以我们在讲儒学的时候，必须看到同样有反儒的种种说法。比如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庄子说：“诸侯之门而仁义出焉。”老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在某些方面是矛盾的。道德有很多方面，孔子希望各种道德之间是互相一致的，可偏偏有些人在不同的道德上表现是不一致的，如私德好公德不好，这一类人自古就有很多。

现在有这一种说法，说中国文化本来是很好的，出了一个“五四”，把中国文化的脉络弄断了。我个人认为，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是摒弃“五四”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需要的一次洗礼，虽然这次礼洗的气势大了一点，但却给传统文化创造了一次新生的机会。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面对日本侵略，八国联军侵华，如果我们不发展洋务运动，不生产洋枪洋炮，不就等于自甘堕落、自取灭亡吗？